

论西属美洲克里奥尔民族主义的 形成及其局限性^{*}

韩 琦

内容提要：克里奥尔人上层是西属美洲独立运动的领导阶级，他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形成，是独立战争爆发的关键。克里奥尔民族主义在先后经历了民族意识的文化认同阶段和政治认同阶段之后，最终在宗主国突发事件的刺激下瓜熟蒂落，随后在独立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克里奥尔民族主义有两个局限性，即精英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占支配地位。这两个局限性不仅决定了西属美洲独立战争的果实为少数人占有，而且对后来的西属美洲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关键词：西属美洲 克里奥尔人 民族主义 局限性

在以往国内学者对西属美洲独立运动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即认为在独立运动前夕，克里奥尔人承认印第安人的祖先是自己的祖先，宣布与西班牙人不同宗。而印第安人也承认克里奥尔人的美洲籍，将他们同西班牙殖民者区分开来。这是殖民地民族意识的升华。“各种族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和斗争终于形成的共同心理状态”标志着西属美洲殖民地民族的最后形成。“印第安人、欧洲人和非洲人经过长期的文化碰撞、磨合与血缘交

^{*} 本文是在作者提交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第17届年会暨“纪念拉美独立200周年”学术讨论会参会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是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项目编号：14JJD770012）的阶段性成果。

融，促使拉美的人种状况发生了变化。他们在价值趋向、思想情感、语言文化上逐渐趋于一致，形成了拉美民族的独立意识。”^① 这样的论断对拉美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形成似乎估计过高。事实上，时至今日，拉美各国家的民族认同问题和整个拉美的地区认同问题仍没有解决。本文认为，在西属美洲独立前夕并没有形成囊括各种族的统一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形成的仅仅是一种克里奥尔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具有两个局限性，即精英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占支配地位，其对后来的拉美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一 克里奥尔民族主义的形成

克里奥尔人（即土生白人）上层是西属美洲独立运动的领导阶层，他们主要由大庄园主、矿主、商人以及某些专业人士组成，他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形成，是独立运动爆发的关键。而这种民族主义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 1700 年之前的文化认同阶段；18 世纪的政治认同阶段；1808 ~ 1810 年外部事件引致的最终形成阶段。

（一）克里奥尔人的文化认同阶段

克里奥尔人的民族意识首先来源于克里奥尔人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的发生可以追溯到殖民征服时期征服者本人和他们后代的离心倾向。当时的征服者受中世纪观念的影响，自认为是新王国的建立者，他们自己则是西班牙君主的封臣，按照中世纪国王与封臣之间的契约，后者服军役，就应该得到国王的奖赏。在新大陆，这种奖赏就是委托监护权（Ebcomienda）。征服者被授予监护印第安人的权利，印第安人向监护者提供劳役和贡税。征服者们要求监护权的世袭制，想成为永久的贵族，但国王不愿意看到西班牙曾有的封建贵族尾大不掉的局面在新大陆重演，于是在 1542 年颁布了《新法律》，旨在取消委托监护制。结果引起了整个殖民地的骚乱。在秘鲁，皮萨罗的弟弟贡萨洛·皮萨罗发动叛乱，杀死了前去执法的秘鲁新

^① 郝名玮《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民族形成刍议》，《拉丁美洲研究》1986 年第 4 期；张家唐：《论拉美民族独立意识的形成》，《历史教学》（高教版）2007 年第 2 期。

总督,被拥为秘鲁最高首领。在新西班牙,科尔特斯代表监护主上书王室西印度事务委员会,反对《新法律》。1565~1568年一伙殖民者又鼓动科尔特斯的儿子马丁·科尔特斯发动叛乱,想控制墨西哥。虽然这些反叛最终遭到了失败,但“征服者后裔与西班牙官员之间不断扩大的裂缝是早期民族主义最重要的成分之一,这种裂缝将新西班牙永久地分割成了两个部分,即克里奥尔人和卡秋平(半岛人)”^①。由于殖民者与西班牙官员之间的矛盾,由于在远离宗主国的新的土地和环境中生活,到17世纪中期,新西班牙和秘鲁总督区的克里奥尔人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他们属于一种在许多方面都独立于“母国”的新文化。^②

克里奥尔精英与他们出生或居住的美洲土地的亲密关系,促成了一种不同于西班牙文化的克里奥尔文化的诞生。多明我会的迭戈·杜兰在1580年完成的《西印度史》的前言中写道:他的意图是净化“他的祖国(新西班牙)的名号,因为这个名号被不久前到达这里的西班牙人所加诸的草率和苛刻的评价糟蹋了”^③。克里奥尔人文化的第一批产物是神的画像和祈祷文,以及传教士们的布道词,因为西班牙人和克里奥尔人在观念上的对立如此之大,以至于延伸到宗教信仰上,他们之间在追求和占有神的恩赐的遗迹上展开了竞争。在新西班牙,克里奥尔人的圣母被称为“瓜达卢佩·玛利亚”,是墨西哥城的守护神,后来成为独立运动中的民族象征。而西班牙人的保护神则被叫作“卡秋平女人”。16世纪和17世纪一些克里奥尔作家创作了不少神话、传奇和历史著作,论证了克里奥尔人民族意识的历史合法性。如墨西哥的克里奥尔知识分子卡洛斯·德·西古恩萨·伊·贡戈拉在他写的《克雷塔罗颂》和《印第安之春》(1668年)中肯定了一种扎根于征服之前墨西哥文明中的“克里奥尔民族”的存在,对文学中的美洲意识(一种基督教的虔诚、非基督教神学和爱国热诚的混合物)做出了新的贡献。印加人后裔加西拉索·德·拉·维加写的《印加王室述评》(1609年),记叙了印加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弘扬了印加文明的价值,对美洲人认识自我、树立自尊,对自然

① 莱斯利·B. 辛普森《新西班牙的委托监护制度》(Lesley Byrd Simpson, *The Encomienda in New Spain*),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50,第145页。

② 尼古拉斯·坎尼,安东尼·帕戈登编《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认同,1500~1800》(Nicholas Canny and Anthony Pagden eds., *Colonial Identity in the Atlantic World, 1500-1800*),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第51页。

③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2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第709页。

法的创立乃至欧洲启蒙思想的形成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克里奥尔人为了寻找政治上的合法性，还援引西班牙的政治传统来论证他们与西班牙人的均等地位。按照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政府理论和实践，西班牙君主国是由一连串的小王国在一个天主教国王领导之下组成的，如卡斯提（Castile）、莱昂（Leon）、阿拉贡（Aragon）等，都被当作分离的王国对待，仍保留各自的认同和政府形式，拥有一种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不同的习惯和法律，虽然都效忠于国王，但拥有行政上的自治权。西班牙的这一政治传统被美洲的克里奥尔精英用来支持他们自治的要求。他们公开声称自己是新大陆征服者和早期移民的后裔，祖辈们为国王服役使得美洲王国（秘鲁、新格拉纳达、智利、基多等地）的创建成为可能，也正是根据这一理由，他们要求在他们的前辈为国王带来的土地上行使政治和宗教权力。这些观念使得克里奥尔人把美洲看作王国，而不是殖民地，把他们自己看作西班牙民族（Nation）的一个部分，但又有所区别。在他们的观念里，尽管有国王这一纽带将他们与西班牙在欧洲的王国团结在一起，但他们在政治上是相互分离的；尽管在种族、语言和宗教上的一致性将他们与母国联系在一起，但他们的社会环境和习惯又使得他们在文化上有别于西班牙。^①

克里奥尔人的社会认同则是建立在一种贵族统治的社会概念和一种以西班牙人为中心的种族等级制概念之上的。美洲社会是一个种族等级制度的社会，其中有三个主要的种族团体，西班牙人为第一等级，其次为印第安人，再次为非洲人。克里奥尔精英自认为是统治阶级，因为他们是西班牙人的后裔，是贵族。他们自认为有权占据社会的重要位置，国王应该庇护和任命他作为当地的官员。一些在美洲的富有家族在要求贵族地位方面有认同感，^②因

① 安东尼·麦克法兰《认同、启蒙和殖民地晚期西属美洲的政治歧见》（Anthony MacFarlane, Identity, "Enlightenment and Political Dissent in Late Colonial Spanish America"），《皇家历史学会学报》第六系列第8卷（1988），网络版，第312页。

② 据布拉丁研究，17世纪就有不少人购买到贵族头衔。在整个18世纪，新西班牙的矿主、商人和大地主中就有49个人通过购买和获得奖赏而得到了贵族头衔，其中19人是克里奥尔人。见D. A. 布拉丁《在波旁王朝时期墨西哥的矿主和商人：1763～1810》（D. A. Brading, *Miners and Merchants in Bourbon Mexico, 1763-1810*），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第208页。而据阿尔韦托·弗洛雷斯·加林多研究，在1761～1810年之间，在秘鲁总督辖区获得贵族头衔的达340人之多。见约翰·林奇编《拉丁美洲革命，1808～1826，新旧大陆的起源》（John Lynch ed., *Latin American Revolutions, 1808-1826: Old and New World Origins*），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94，第154页。

为贵族称号不仅赋予他们声望，而且赋予他们获得官职的特权。由于西班牙人在教育、官职、专门职业、宗教职位中被赋予优越的地位和公开的机会，作为一个西班牙人本身就意味着享有法律和社会特权，因此，克里奥尔人自认为有别于另外两个种族，而与西班牙人是同一个民族。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克里奥尔人的民族认同还是一种双重认同，既认同美洲人又认同西班牙人，而美洲人的认同主要是文化上的认同。

克里奥尔人的民族意识在 1700 年之前得以较为顺利地成长，除了克里奥尔人的主观努力外，哈布斯王朝的政策也为其提供了宽松舒适的环境。在殖民征服初期，西班牙国王曾一度利用“先遣官制”和“委托监护制”来鼓励殖民活动，但不久就以一套官僚行政体制取而代之。尽管如此，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美洲帝国，在政治上仍依赖克里奥尔人的积极合作。克里奥尔人不仅通过市政会议控制了地方政府，而且在许多层面上渗透到了王室的财政管理、检审庭甚至教会上层。这样，尽管哈布斯堡王朝没有正式认可土生白人的政治职位和自治的权利，但在政治实践中已经默许了他们所掌握的大量权力，尤其在市政会一级的权力。这反过来加强了克里奥尔人对他们与国王之间契约的信念，即按照这一契约，国王认为克里奥尔人是当地出生的，因此赋予他们在西班牙国王权威之下的掌管当地事务的权力。而哈布斯堡国王似乎也模糊地接受了克里奥尔人应该在他们自己的行政管理中扮演一个角色的事实。在经济方面，17 世纪虽然矿业有所衰落，但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得到了发展，殖民地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得到加强。^①然而，波旁王朝开始后，美洲政策发生了变化，克里奥尔人的民族认同的性质也随之产生了新的转变。

（二）克里奥尔人的政治认同阶段

18 世纪，波旁政府的改革政策和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推动克里奥尔人的民族意识由文化认同转变为政治认同。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3 年）之后，波旁王朝实现了对西班牙的统治。为了挽救西班牙帝国的衰落，波旁王朝开始实行“开明君主专

^① 约翰·林奇《西属美洲革命：1808～1826》（John Lynch, *The Spanish American Revolutions, 1808-1826*），纽约，1986，第3～5页。

制”，分别在母国和殖民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从菲利普五世（1700～1746年）开始，到卡洛斯三世（1759～1788年）达到顶峰。在殖民地，波旁王朝通过增加半岛移民和去当地化管理两个方面弱化克里奥尔人的特权，加强宗主国的控制。前者如西班牙到美洲的新移民在1780～1890年比在1710～1730年增加了4倍，这些从西班牙北部来的新移民很快成长为企业家阶级，增加了对当地克里奥尔人的生存压力。^① 后者表现在西班牙人对高级官职和经济的垄断。如在1751～1808年任命的266名检审庭法官中，只有62人是克里奥尔人，仅占23%，而此前检审庭的大多数法官是克里奥尔人。在1808年的99个殖民地审判员中，只有25人是克里奥尔人。^② 在18世纪后半期西属美洲教阶组织中，56.8%是半岛人，43.1%是克里奥尔人。虽然克里奥尔人的比例不算小，但克里奥尔教士一般被安排在最贫困的郊区，如新西班牙最好的三个教区（墨西哥城、普埃布拉、米却肯）在1713～1800年只有一个美洲人（古巴人，而非墨西哥人）被安排在这里。^③ 1767年王室从美洲驱逐了2500名耶稣会士中，大多数是克里奥尔人。这实质上是半岛人在宗教问题上对克里奥尔人的公然挑衅。军队改革最初加强了由克里奥尔人担任军官的殖民地民团的作用，但1780年秘鲁印第安人叛乱后，民团的作用被贬低，防务责任归还给正规军，正规军和民团的高级军官一律由西班牙人担任。克里奥尔人沿军队阶梯逐步提升的道路也被切断。在经济上，新颁布的“自由贸易法令”仅仅是一种帝国内部的贸易自由化，仍然保留了禁止殖民地与宗主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自由贸易的限制；税制改革增加了税源，提高了税率，并将通常留在殖民地的经济剩余和财政收入转移到宗主国，实际上是尽最大努力增加宗主国的收益。在墨西哥，西班牙王室收益从1712年的300万比索增加到18世纪末的每年1400万比索。^④ 1804年，为增加税收，王室颁布《整顿资产法令》，命令没收美洲的慈善基金，全部汇往西班牙。此举不仅使教会财产受到侵犯，损失惨重，而且影响到许多以教会基金为资本和信贷的人的经济利益，如众多庄园主、商人

① 约翰·林奇《西属美洲革命：1808～1826》，第17页。

② 约翰·林奇《西属美洲革命：1808～1826》，第18页。

③ 约翰·林奇《在殖民地与国家之间的拉丁美洲：文选》（John Lynch, *Latin America between Colony and Nation: Selected Essays*），纽约，帕尔格拉夫，2001，第111～112页。

④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第12页。

和矿主。尽管该法令在 1808 年被终止,但在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留下了裂痕。克里奥尔人在政治、宗教、军事、经济等若干方面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了半岛人的挤压和排斥。

波旁政府的改革政策被认为是对新大陆的“再征服”,其与第一次征服的区别是,前者是对印第安人的征服,后者是寻求对克里奥尔人的控制。从人口发展的趋势看,半岛人只占很小比例。在 1570 年,在西属美洲的白人约为 11.5 万至 12 万,其中克里奥尔人刚刚过半。到 1800 年,在整个 1690 万人口中,白种人为 320 万,其中半岛人只有 3 万至 4 万。^①但王室的政策无疑增强了克里奥尔人对半岛人的敌视。正如亚历山大·洪堡所说:“最粗野、受教育最少、毫无教养的欧洲人也感到自己要比新大陆出生的人高一等。”林奇也写道:“克里奥尔人和半岛人互相厌恶的迹象十分明显,无法否认;也十分普遍,不能忽视。他们的对抗是当时社会紧张关系的一个方面。同时代人谈论它,旅行者评论它,官员们深刻地感觉到它。西班牙官员和美洲人都知道有这种分歧存在。”^②半岛人优先获得官职和机会所造成的对立,是独立革命的重要起因。对此,玻利瓦尔后来在《牙买加来信》中做了系统深刻的揭示:“在统治和执政方面,我们一直是被排斥在外的。除非特殊情况,我们从未当过总督和都督;很少有人当过大主教和主教;从未有人当过外交官;当军官,只能当下级军官;当贵族,并没有真正的实权;我们既不能当律师又不能掌握财权,连商人也几乎当不成,因为这是直接触犯法规的。”^③这说明克里奥尔人与半岛人之间在政治上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

在宗主国的高压政策面前,克里奥尔人不再限于重申他们的政治权利,而是以起义的形式更为激烈地表达了他们的反抗。重要的起义包括 1765 年基多城的抗税运动,1781 年新格拉纳达反对税收改革和官职任命偏见的公社起义,1780~1782 年秘鲁图帕克·阿马鲁领导的大起义,等等。除了图帕克·阿马鲁起义外,其他起义都在殖民制度的框架内,并没有对殖民地

① 约翰·林奇《西属美洲革命:1808~1826》,第 19 页。

②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 3 卷),第 27~29 页。

③ 西蒙·玻利瓦尔《一位南美洲人给牙买加岛一位先生的回信,1815 年 9 月 6 日》(Simón Bolívar, “Answer of a South American to a Gentleman of Jamaica Island, 6 September 1815”),转引自约翰·林奇编《拉丁美洲革命,1808~1826,新旧大陆的起源》,第 313 页。

社会结构提出挑战。尽管克里奥尔人领导或参与了这些起义，并宣称了他们作为“美洲人”的认同，明确地要求“美洲人”在官职任命方面应该优先于半岛人，但在他们对土生白人权利的解释中并没有一般地提出从西班牙独立的要求，只不过表达了对王国与国王之间传统“契约”概念的一种捍卫，目的是维持过去的惯例，而不是去推翻它们。这种抗议运动未能创造出一种囊括其他所有民众的总体性认同。这样，在整个18世纪末的起义中，克里奥尔人与下层民众起义者的联盟很快就崩溃了，因为克里奥尔人对印第安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恐惧超过了他们对西班牙人和西班牙政治的不满。此时，克里奥尔人关于文化认同和政治权利观念的表达仍沿用着传统王国的政治语言，只是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他们才获得了一种对美洲人权利的新的理解和表达方式。

林奇认为，从年代来说，启蒙运动的影响姗姗来迟。“1780~1781年的革命很少受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只是到这次革命和1810年间才开始扎根。18世纪90年代，启蒙运动的传播加速。”^① 启蒙运动思想在独立之前、独立期间和独立之后，都是克里奥尔精英用来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护的重要思想来源。启蒙思想首先通过有关新大陆的科学辩论强化了克里奥尔人的民族认同。随着启蒙著作的传播，人们发现欧洲思想家中的某些人居然蔑视新大陆和住在那里的人。如法国博物学家布丰认为，新大陆气候和环境的不良特征使那里的生物退化和低劣。^② 普鲁士传教士科内利乌斯·德保夫认为克里奥尔人缺乏不屈不挠的精神，智力和体力均过早衰退。^③ 提出这种关于欧洲人和美洲人差异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克里奥尔人是否有能力自我管理的问题。这些玷污新大陆人的论点自然引起了克里奥尔知识分子对美洲环境和美洲人的捍卫。被放逐到意大利的思念家乡的耶稣会会士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克拉维赫罗撰写了4卷本的《墨西哥古代史》（1780年），用一系列的专题论述逐点反驳了德保夫的毫无根据的断言。^④ 他的同事胡安·德·贝拉斯科（Juan de Velasco）则撰写了一部基多王国史，盛赞前西

①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第44页。

② 托马斯·F. 格利克《拉美的科学和独立（着重于新格拉纳达）》[Thomas F. Glick, "Science and Independence in Latin Americ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New Granada)"], 《西班牙美洲历史评论》（*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91年第2期，第31页。

③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2卷），第723页。

④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2卷），第723页。

班牙时代的安第斯社会。胡安·巴勃洛·比斯卡多在《致西班牙美洲人的信》（1799年）中写道：“新大陆就是我们的家园，它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和兴趣驱使我们在这一历史中寻找我们目前处境的原因，使我们由此决定采取必要的行动以挽救我们和我们后代正当的权利。”^①一些克里奥尔自然科学家则将他们的兴趣集中于他们所居住地区的地理和资源的调查与研究上，由此刺激了他们与他们所出生的土地的认同意识。大学课程的改革和现代科学思想的引进也鼓励克里奥尔人以新的方式思考问题。同时，对改善对外交流和传播有用知识的强调促进了新报刊的涌现，克里奥尔人拥有了史无前例的机会接受消息和吸收新的来自外部世界的思想，新报刊的印刷发行为批评西班牙政府和培育克里奥尔人的美洲认同提供了良好的媒介。

启蒙思想让克里奥尔人获得了政治灵感，其中关于自由的和共和的思想，直接激起克里奥尔人对政治独立的要求。欧洲思想家霍布斯、洛克、边沁、孟德斯鸠、卢梭、潘恩、雷纳尔等都在西属美洲独立的各种演说中留有痕迹。克里奥尔精英对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理论并不陌生，据此他们能够接受自由和平等的观点，也同意政府的目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衡量幸福的标准是物质进步。但对克里奥尔人来说，自由已经不单纯是从18世纪专制主义国家下获得自由，而是从殖民地宗主国下获得自由，平等则是与母国西班牙人的平等，而达到这两个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独立。潘恩的《常识》（1776年）是对殖民地起义的直接辩护，他把捍卫美国独立看作“真正的利益”，鉴于美国所遭受的苦难并无以补偿，以及反抗压迫的权利，“假如一个大陆被一个海岛永久地统治下去则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我们原来号召的革命基本是一种人的变更和当地环境的选择……但我们现在从世界上、从美国和法国革命中看到的，是一种事物自然秩序的革命”。^②潘恩的话就像在说西属美洲的事，给西属美洲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书被一位委内瑞拉人于1811年翻译成西班牙文并在美国出版，很快流传到西属美洲，并对共和国制宪思想产生了影响。法国神父雷纳尔在他写的《西印度历史》（1781年）中也转引了潘恩的著作，描述了美国革命，

① 约翰·林奇 《在殖民地与国家之间的拉丁美洲：文选》，第106页。

② 约翰·林奇 《在殖民地与国家之间的拉丁美洲：文选》，第102页。

赞扬了殖民地人民为争取自由而与英国国王滥用权力所进行的斗争。雷纳尔的著作深深影响了另一位叫多米尼加·德·普拉多的法国神父，此人成为欧洲第一个号召西属美洲殖民地彻底独立的欧洲人。

启蒙思想对西属美洲的影响在独立前已经有了一些实际表现：“在1789年以后，可以常听到土生白人自傲的讲‘我不是西班牙人，我是美洲人。’”^①其民族认同已经不再是双重认同，而是成为“美洲人”的单一认同。再如，《大陆会议宣言》的西班牙文本早在1777年就已经传到了何塞·伊格那西奥·莫雷诺博士手中，后来他担任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校长并成为1797年密谋活动的参加者。这次起义的领导人曼努埃尔·瓜尔和何塞·玛丽亚·埃斯帕尼亚甚至直言不讳地主张建立委内瑞拉共和国。要求领导人均以“美洲人民”的名义发布命令。^②1793年克里奥尔青年安东尼奥·纳里尼奥翻译和印刷了法国《人权宣言》，并在友人之间散发，结果被逮捕并押送到了西班牙，后来越狱逃跑，成为哥伦比亚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805年玻利瓦尔与他的导师罗德里格斯同游意大利，8月15日在罗马城萨克罗山顶当着导师的面宣誓，誓为西属美洲的独立而献身：“……以我的名誉向祖国宣誓：不打碎根据西班牙政权的意志压迫我们的枷锁，我誓不罢休！”^③米兰达1784年就在纽约形成了“整个西属美洲大陆的自由和独立”的构思。1801年他在《告哥伦比亚大陆人民书》中主张：“必须推翻这一残暴的统治，真正的主人必须夺回被褫夺的权力，被外国势力强占了的政府权力必须回到本国百姓手中。洛克说得好：这种征服者的政府是完全非法的，是完全违背自然法则的，应该立即推翻它。”^④他在1806年甚至组织了一次不成功的解放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但是，上述表现依然是零星分散的，在殖民地主要城市克里奥尔人中的早期民族主义，其力量尚不足以推动他们形成一种与宗主国要求平等和独立的政治组织。这种情况只是在1808年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激起整个帝国的危机之后才发生扭转。

① 约翰·林奇编《拉丁美洲革命，1808~1826，新旧大陆的起源》，第290页。

② 奥古斯托·米哈雷斯《解放者》，杨恩瑞等译，中国翻译出版公司，1983，第61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翻译《玻利瓦尔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4页。

④ 弗兰西斯科·德米兰达《告哥伦比亚大陆（即西班牙美洲）人民书》（Francisco de Miranda, *Proclama a Los Pueblos del Continente Colombiano, Alias Hispano - América*），1801，见 <http://www.uniondelsur.menpet.gob.ve/interface.sp/database/fichero/.../4>。

(三) 克里奥尔民族主义最终形成阶段

1808 年拿破仑入侵西班牙,刚刚继位的国王费迪南德七世被囚禁于法国,拿破仑之兄约瑟夫篡夺王位。西班牙普遍爆发了反法起义,出现了很多地方“洪达”(Junta,执政委员会),在塞维利亚成立的中央“洪达”,以国王的名义执政,统一领导反法斗争,并决定恢复存在于中世纪但已经关闭 300 年的议会。根据植根于西班牙中世纪又被近代经院哲学家弗兰西斯·苏亚雷斯等人加以发展的政治理论,国王的权力最初来自人民,当国王不在位的时候,权力应该被归还给人民。西印度的臣属地位是将西印度王国与卡斯提和莱昂的合法国王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隶属于西班牙国家的。因此,当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七世在巴约内(Bayonne)放弃王位之后,这一政治联系也就中断了,人民的共同体,即惯常的主权持有者就被认定是合法的继承人,其反过来必须提供新的权力的任命。^①因此,当美洲人听说费迪南德被囚的消息后,不少地区相继成立了“洪达”。这时,西班牙的中央“洪达”渴望得到美洲支持,并邀请美洲人派代表参加中央“洪达”和议会的会议。议会的首次会议于 1810 年 9 月在加的斯市召开。

美洲的克里奥尔人还是积极地参加了在西班牙的中央“洪达”和议会的会议。但是,克里奥尔人的热情不久就遭遇了冷水。因为在西班牙的政府不愿意给予海外领地平等的代表权。“1200 万人口的宗主国在中央‘洪达’中拥有 36 个席位,而 1400 万~1500 万人口的西属美洲却仅仅得到 9 个席位,稍后,它又补充得到 3 个席位。”^②随后,在制宪议会中,美洲代表问题和美洲自由贸易问题成为政治辩论的焦点,制宪者认为代表名额应按人口比例分配,照此标准美洲能占三分之二多数席位,但议会没有这样做,它不允许美洲拥有平等代表权(未给非洲人后裔选举权)。美洲代表要求的“与一切国家开展贸易的自由”也被否决。这种情况自然激化了克里奥尔人的民族意识和自治意识,引起了独立的最后行动。于是,在整个西属美洲,克里奥尔人号召通过建立像西班牙那样的自治“洪达”来进行自我管理。1810 年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4 月)、布宜诺斯艾利斯(5 月)、新格拉纳达的波哥大(7 月)、

① O. 卡洛斯·斯托艾策尔《西班牙美洲革命的学术根源》(O. Carlos Støetzer, *The Scholastic Root of the Spanish American Revolution*),福特汉姆大学出版社,1979,第 259 页。

② 米罗舍夫斯基《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三联书店,1960,第 134 页。

基多(9月),智利的圣地亚哥(9月)、墨西哥城(9月)均建立了自己的统治机构“洪达”。1811年7月委内瑞拉召开国民大会宣布与西班牙彻底决裂,在西属美洲国家中第一个正式走上独立之路。在接下来持续15年的西属美洲反西班牙独立战争中^①,克里奥尔民族主义发挥了领导作用。

二 克里奥尔民族主义的局限性

克里奥尔民族主义起源于征服时期的殖民者的离心倾向,经历了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两个阶段。克里奥尔人拥有某种构成一个民族的资格,即共同的地域、语言、宗教、习惯和传统,而最近的经历又加强了他们的自我认同感。政治权力、经济自由和社会秩序是他们的基本要求,但自1750年之后他们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的政治空间在缩小,经济机会在丧失,挫折感越来越强,最终,与宗主国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他们认识到,只有独立才能使要求得到满足。于是,独立就成为克里奥尔民族主义的目标。但是,克里奥尔民族主义具有两方面的局限性,即精英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占支配地位。

(一) 精英民族主义居支配地位

克里奥尔人的民族意识是一种精英民族意识,在西属美洲最初的三个主要种族构成中,这种民族意识实质上并未包括后两个种族。当克里奥尔人承认印第安人的祖先是自己的祖先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分离倾向寻找合法性依据。他们虽然赞扬古代印第安文明的成就,但是认为当代印第安人肮脏、堕落,很少具有其祖先的优点。同时,克里奥尔人的民族主义又是同宗主国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产物。由于西属美洲种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克里奥尔人的处境实际上比较尴尬。玻利瓦尔对此有很好的描述:

我们既非印第安人,又非欧洲人。而是介于美洲土著和西班牙征服者之间的人。按出生地来说,我们是美洲人,但我们的权利来自欧

^① 1826年1月22日,秘鲁解放军攻克西班牙最后一个据点卡亚俄,标志着西属美洲大陆的全部解放。

洲。总之,我们不得不强调这些权利以反对印第安人的权利,同时,捍卫我们自己的权利以抵抗侵略者的敌视。因此,我们的处境是极其特殊和复杂。^①

克里奥尔人在向西班牙人要求自由和平等的时候,并不打算给予印第安人和黑人以自由和平等。倘若克里奥尔人用一只眼睛看着西班牙人的话,另一只眼睛就要盯着他们的仆人。他们一方面对西班牙人的政策表示不满,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堡垒周围又聚集着人数超过他们数倍的印第安人、墨斯提索人、自由黑人、穆拉托人和奴隶。^② 在18世纪后期,许多地方的贫富差距有所扩大,下层阶级的不满也有所增强,但通常都遭到殖民地政府和克里奥尔上层人士的野蛮压制。因此,克里奥尔人担心任何反对宗主国的起义行动会很容易转变为反对他们的公众骚乱。法国大革命和海地革命的先例已经对克里奥尔人敲响了警钟,图帕克·阿马鲁二世起义和墨西哥伊达尔戈起义中对待克里奥尔人的表现都说明了这种担心的必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担心从另一方面增强了克里奥尔人的阶级和民族意识。^③

当克里奥尔人在强调民族意识的时候,当他们在使用“祖国、家园、民族、美洲人”这些词语的时候,他们说的和他们的实际意图往往不是一回事。民族主义口号是克里奥尔人将独立斗争合法化的一种手段,通过这些口号会使独立的目的看上去似乎是解放整个殖民地社会,但克里奥尔人绝对不承认印第安人和黑人与他们具有同等的社会地位,他们只是想通过提出平等和民族认同的口号,模糊种族和阶级差异,动员其他种族的人积极参与反对西班牙人的独立运动而已。在独立战争中,克里奥尔领导人一方面需要其他下层种族的支持,另一方面又藐视他们,不相信他们。例

① 西蒙·玻利瓦尔《一位南美洲人给牙买加岛一位先生的回信,1815年9月6日》,转引自约翰·林奇编《拉丁美洲革命,1808~1826,新旧大陆的起源》,第312页。

② 在独立的时候,新西班牙白人占20%;墨斯提索人占20%;印第安人占40%,其他类型的人占20%。在新格拉纳达,白人33%;墨斯提索人占43%;印第安人占17%;奴隶6.5%,当时委内瑞拉有6万奴隶。基多90%是印第安人。詹姆士·邓克利编《拉美民族国家形成研究》(James Dunkerley ed., *Studies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 - State in Latin America*),伦敦大学出版社,2002,第67页。

③ 本尼迪特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49页。

如，当克里奥尔人寻求从西班牙人处获得自由的时候，他们并不愿意解放奴隶，迟迟不出台解放奴隶的政策。当圣马丁 1821 年作为解放者在秘鲁宣布原居民在未来将不再被称作印第安人或土著，而将被称为“秘鲁人”的时候，^① 实际情况是大量的印第安人站在保皇派一边，秘鲁爱国者与印第安人缺少一致性。圣马丁这样做一方面是承认所有本地人为新的共和国公民，通过人为创造的民族认同来调和秘鲁社会内部的分歧，引导其团结一致对抗共同的外敌，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当时从当地招募士兵充实军队的紧急需要。因此，圣马丁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政治策略。

印第安人具有一种概念不同的民族意识。如图帕克·阿马鲁在他 1780 年 11 月 16 日的宣言中，宣布废除贡税，给予奴隶自由，号召秘鲁人为了该王国的共同利益而帮助他对抗欧洲人。他的所谓“秘鲁人”包括克里奥尔人、墨斯提索人、桑博人、印第安人和所有秘鲁本地人，唯一被排除的是半岛人，他称后者是“外国人”，前者是“同胞”，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意识的表露，但更重要的是图帕克·阿马鲁看到了克里奥尔人与西班牙人之间的矛盾，他想争取克里奥尔人参加到他的安第斯起义运动中来，这是图帕克·阿马鲁谋略的表现。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印第安人对克里奥尔地主的惩处和杀戮越来越多，原来参加起义的克里奥尔人愈益惧怕印第安人的社会革命，纷纷逃入西班牙人的阵营。历史表明，这场革命的真正宗旨是反对白人（包括土生白人）特权，结束印第安人的屈辱地位。摆脱西班牙人的统治仅仅是运动目标的一部分，最终，他们要复兴昔日的印加帝国。因此，“印加民族主义”与克里奥尔人的利益从实质上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图帕克·阿马鲁的民族意识是当时印第安人中的特例。他是印加贵族的后裔，是墨斯提索人，拥有土地和骡队，享有奥罗佩萨侯爵称号，在库斯科的圣弗兰西斯科·德·博尔哈学院受过高等教育，不仅了解西班牙人的文化传统，^② 而且 1778 年在利马时还经常参加当地商人发起的读书会，

① 约翰·林奇：《西属美洲革命：1808～1826》，第 277 页。

② 戴维·布拉丁：《最初的美洲：西班牙君主，克里奥尔爱国者和自由国家，1492～1867》（David Brading, *The First America, the Spanish Monarchy, Creole Patriots, and the Liberal State, 1492 - 1867*），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第 489 页。

深受《王室述评》一书的影响。^①因此,他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他在起义宣言中所表达的民族意识,是一位早熟起义领袖的思想,并非一般印第安人的观念。普通印第安人所熟悉的是村社、庄园或地方行政机关,再没有比它们更大的实体了,受这种视野的限制,他们的目光一般比较短浅。1810年独立战争爆发后,参加爱国者或保王派军队的印第安人一般都没有强烈的政治信念和动机,他们可以为敌对的双方服役,而并不感到心理上的不安。一位上秘鲁的独立派游击队首领曾劝告属于保王派的印第安人:“祖国是我们居住的地方,祖国应该是我们不惜任何代价为之捍卫的真正原因,为了祖国我们应该牺牲我们的利益乃至整个生命……”但对方却无动于衷:“他们说,他们只为国王和领主而死,他们不会反叛,不会去为祖国效劳。他们不知道祖国是什么,意味着什么,长得什么样子,是男人还是女人。至于国王,他们知道他,知道他的政府运行良好,他的法律受到尊敬和遵守。所以他们将为国王而死。”^②

独立运动期间,尽管起义领导人曾许诺废除印第安人的贡税和“米达制”,但许多印第安人仍不相信享有特权的克里奥尔爱国者,仍站在西班牙人的一边,例如在秘鲁和玻利维亚,印第安人构成了保王派军队的主体。

黑人和奴隶在当时几乎完全没有民族意识。西班牙政府对帕尔多人(Pardos 非洲裔自由人,包括混血种人)的政策比较温和,如准许他们参加民兵,也可以通过购买王家敕令、赦免证明,买到白人的合法身份。根据1795年2月10日法令,他们可以通过申请解除卑贱身份,一旦获准,就有资格接受教育、同白人结婚,担任公职和神职。^③这种政策模糊了非洲裔混血种人与白人的界限,有利于他们社会地位的上升。就奴隶而言,1789年5月31日的新奴隶法,明确规定了奴隶的权利和义务,并设法给奴隶较好的生活和劳动条件。^④但是,西属美洲的白人强烈反对这样的让步,他们认为

① 埃德加·蒙铁尔《加西拉索、印加与美洲独立》,《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第1期,第70页。

② 何塞·桑托斯·瓦加斯《美洲独立时的一位指挥官的日记:1814~1825》(Jose Santos Vargas, *Diario de un Comandante de la Independencia Americana, 1814-1825*),墨西哥,1982,第118页。转引自约翰·林奇《在殖民地与国家之间的拉丁美洲:文选》,第106页。

③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第30页。

④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第32页。

这些政策对帕尔多人和奴隶过于宽容，抱怨自己被宗主国抛弃，并决心坚持种族歧视。委内瑞拉的帕尔多人和奴隶占人口的 61%，种植园主的抗议最激烈。因此，在独立战争开始时，整个西属美洲的奴隶并不支持爱国者，玻利瓦尔既没有为印第安人做出任何保证，更没有对黑人表示亲热和发出号召，结果他的军队不断被博韦斯组织的效忠王室的帕尔多人游击队打败。只是在 1816 年 6 月颁布了解放奴隶法令和 1817 年允诺分配土地给士兵之后，才扭转了人心向背的不利局面。在独立战争期间，黑人在保王派和爱国者军队的两边左右摇摆，这种立场的不稳定主要是由于他们受眼前利益所驱使，他们参加战斗，心中只想他们自己的待决事项。为此，许多非洲裔混血种人将他们的命运与保王派联系在一起。

混血种人的民族意识一般来说比较模糊^①，但这并不排除个别混血种人具有清醒的民族意识。如墨西哥的莫雷洛斯就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莫雷洛斯出生于一个墨斯提索人家庭，曾在大庄园里当过劳工。在圣尼古拉斯神学院学习时是伊达尔戈的学生，毕业后当了一名教士。当伊达尔戈牺牲后，他就成了南方起义军的领袖。他的起义纲领是实现独立、建立议会制政府和进行社会改革（包括废除贡税、奴隶制、等级制等）。在他的讲话中，美洲人和半岛人的区分很明确。如他在 1810 年的一份公告中指出：“除了欧洲人以外，其他所有居民不能按照他们的血统称为印第安人、穆拉托人或其他混血种人，而应该一律称作美洲人。”^② 他称，“独立战争是正义的，因为可恨的西班牙人是人类的敌人，他们三个世纪以来奴役土著居民，阻止墨西哥的发展，占据它的财富和资源”。他宣布，现在“我们发誓为了捍卫我们神圣的宗教和我们的祖国，我们宁可牺牲我们的生命和财产”^③。在一次艰难的行军中，为了鼓舞士气，莫雷洛斯对战士们讲道：“半岛人总

① 殖民地时期混血种人没有法律地位，受到白人和印第安人村社双方的排斥，他们本身也缺乏内在的认同。直到 19 世纪后期仍被认为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其父母双方种族的多种缺点，没有领导能力。见迈克尔·B·怀特福特编《跨越急流：拉美的连续和变革》（Michael B. Whiteford ed., *Crossing Current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Latin America*），普伦蒂斯霍尔公司，1998，第 14 页。

② 戴维·布拉丁：《最初的美洲：西班牙君主，克里奥尔爱国者和自由国家，1492～1867》，第 579 页。

③ 约翰·林奇：《西属美洲的考迪罗，1800～1850》（John Lynch, *Caudillos in Spanish America, 1800-1850*），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第 159 页。

是极力贬低美洲人，认为我们是野蛮的、无能的，甚至不能接受洗礼，因此对教会和国家毫无用处。但我认为正相反。美洲人是第一流的教士、法官、律师、工匠、农夫，现在则是第一流的士兵。在三年半的时间里，我已经知道，每个人也已经看到，美洲人是天生的战士。”^① 这番话引起了战士们们的共鸣，振奋了军队的民族精神。

诉诸民众和诉诸宗教是莫雷洛斯民族主义的两大特点。1813年，莫雷洛斯为即将召开的奇尔潘辛戈国民会议准备了一份题为“民族感情”的文件，其中除了重申废除种族歧视之外，还催促议会在设计法律的时候要注意“缩小贫富差距”，提高穷人的收入，创造一个仅仅有优点和缺点之区分的民族。主权属于人民，现在由国民会议行使，所有的政府职位应该保留给美洲人。天主教将是唯一被允许的信仰，教士由什一税和教区薪俸供养。“圣母玛利亚瓜达卢佩”将是“我们的自由保护神”。^② 但限制教会和军队的司法权，并将大庄园的土地分割成小块分给农民。这些内容均反映了一种民众民族主义的思想。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和伊达尔戈一样，莫雷洛斯的起义很快被保王派军队镇压，他本人在1815年12月被处死。伊达尔戈和莫雷洛斯的政治主张均化为泡影。墨西哥的独立最后是由保王派军官伊图尔维德反戈后完成的。他在伊瓜拉计划（1821年2月24日）中提出“宗教、独立、联合”三项保证的口号，即保证天主教继续存在、实行独立、西班牙人和美洲人联合，意在容纳所有对立派别，建立一种天主教的团结的民族国家。这种和解政策最终被各方所接受，结果，旧的社会结构得以保留，政府的形式是君主立宪制。新国家是一个克里奥尔人的民族国家，而不是民众主义的民族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和莫雷洛斯都受过西班牙传统的高等教育，并且阿马鲁本人并不是纯印第安人，因此，从文化上讲，他们都属于克里奥尔人。尽管他们相对于他们所代表的种族来说，提出

① 埃内斯托·莱莫伊内·比利卡尼亚 《莫雷洛斯，他的文字和当时其他证物所反映的革命生活》（Ernesto Lemoine Villicana, *Morelos, Su Vida Revolucionaria a Traves de Sus Escritos y de Otros Testimonios de la Epoca*）墨西哥，1965，第439页。转引自约翰·林奇《西属美洲的考迪罗，1800～1850》，第160页。

② 戴维·布拉丁：《最初的美洲：西班牙君主，克里奥尔爱国者和自由国家，1492～1867》，第580页。

了超前的独立纲领，但他们的起义很快就失败了。最终是克里奥尔人领导的独立战争获得了胜利，但克里奥尔人并不想让其他种族分享独立运动的成果。

（二）地方民族主义盛行

克里奥尔民族主义从地域的角度看有双重含义，即大陆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持大陆民族主义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米兰达和玻利瓦尔。米兰达有丰富的旅欧经历，熟悉启蒙思想，并参加过美国的反英独立战争，对美国的政治制度也很了解。早在 1790 年 3 月米兰达就提出了西属美洲解放后的立国方案，他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由印加后裔充当国王，并组成上下两院，最高法院由国王任命。但他不愿意设想西属美洲会出现众多独立的实体，始终认为西属美洲将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新国家。^① 玻利瓦尔在早期政治生涯中已经认识到美洲是一个事实上的整体。在 1815 年的《牙买加来信》中他深思熟虑地写道：“把整个新世界组成一个单一国家（Nation），用同一根纽带将各个部分连接为整体，这是一个宏伟的设想。既然整个美洲有着相同的起源、语言、习惯和宗教，它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将不同的国家（States）组成为联邦（Confederation）。”但同时他也看到了当时的条件尚不具备：“然而，现在不可能，因为美洲被不同的气候、地理、利益、特性所分割。”他对独立战争的发展前景做了展望：“美洲各行省（Provinces）现在为争取解放而斗争，它们最终必将胜利。一些行省将适时地建立联邦的和中央集权的共和国。一些大的地区将几乎不可避免地建立君主制，其中有些会遭到如此惨败，以至于在一瞬间或未来革命中解体。一个大的君主制国家是不易巩固的，而要巩固一个大共和国是不可能的。”^② 可见，与米兰达相比，玻利瓦尔更加面对现实。但是，他并不轻易地放弃这个“宏伟设想”。他认为要实现这一“宏伟设想”，首先要实现各地的独立，其次是促进各国的联合，联合的目的是巩固和发展民族独立的成果。

① 米盖尔·霍林、约翰·D. 马茨 《拉丁美洲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Miguel Jorin and John D. martz, *Latin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and Ideology*），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70，第 59 页。

② 西蒙·玻利瓦尔 《一位南美洲人给牙买加岛一位先生的复信，1815 年 9 月 6 日》，转引自约翰·林奇编《拉丁美洲革命，1808～1826，新旧大陆的起源》，第 317～318 页。

为此,他在后来的生涯中进行了不懈的努力。^①

大陆民族主义的理想、玻利瓦尔和圣马丁领导的大陆解放军所进行的反西班牙人战争在整个西属美洲独立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大陆解放军的帮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智利、秘鲁、玻利维亚等地才得以解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西属美洲不像北美那样有一个大陆会议以及它的地方和行省委员会的网状组织机构,可以发号施令、组建军队、任命高级指挥官、征收战争税款、招募兵员、开展外交活动,也没有像华盛顿那样的唯一被认可的领袖和大家正式接受的政治纲领。1810~1826年,各地是分别以独自的方式从事独立活动的,只是在战争后期,在南美洲才出现了南北两个方面的大陆解放军(1817年初圣马丁领导的解放军和1819年5月玻利瓦尔领导的解放军),但二者的行动并非在统一战略指导下进行的,只是一种默契。各地的主权从来没有让与大陆解放军,由于军事力量与领土主权的脱节,在被解放的地区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各地独立派欢迎大陆解放军的到来,当敌人不再构成严重威胁的时候,就诋毁和排斥解放者,各地地方政权与超民族的大陆军队的矛盾凸显出来。“今天把你当作解放者,明天又把你当作征服者”^②,感激和排外并存。秘鲁人、委内瑞拉人和阿根廷人相互之间缺乏信任感。在整个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总督辖区或省府所在地成立的政府声明代表整个地区,但较小的城市抵制它们的统治。各地发表的“独立”宣言越来越多,但宣言的作者们所讲的“独立”往往并不是指一回事,小城市发表的宣言往往是指脱离墨西哥城、利马或布宜诺斯艾利斯,而不一定指脱离西班牙。如巴拉圭在1813年宣布自己是一个“独立共和国”,但它所关心的是脱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独立。蒙得维的亚也于1815年在阿蒂加斯领导下脱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为成立独立的乌拉圭国家铺平了道路。原来属于秘鲁总督辖区的上秘鲁,1776年之后划归拉普拉塔总督辖区,此时它要争取摆脱利马

① 玻利瓦尔在接受独立后出现的各共和国现实的同时,希望建立美洲联邦,这个联邦是西属美洲联邦,既不包括讲葡萄牙语的巴西,也不包括讲法语的海地和讲英语的美国,而建立大哥伦比亚、创建安第斯联邦、筹备和召开巴拿马美洲国家国际大会的努力都是他建立西属美洲联邦的中间步骤。见西蒙·克利尔《在西蒙·玻利瓦尔笔下的民族性、民族主义和超民族主义》(Simon Collier, “Nationality, Nationalism, and Supranationalism in the Writings of Simon Bolivar”),《西班牙美洲历史评论》1983年第1期,第37~64页。

②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第150页。

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两地的支配。1819年在玻利瓦尔的努力下,在原来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的基础上成立了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包括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1826年他又打算将大哥伦比亚与玻利维亚、秘鲁结成一个安第斯国家联邦。但是,玻利瓦尔只有很少几个合作者,即使这几个人也并不完全理解他,因此,他的政治一体化计划实施起来格外艰难。他曾说:“我用双手做的事情,别人却用双脚破坏。一个人同大家斗,他就什么事也做不成。”^①玻利瓦尔最终放弃了他的计划,大哥伦比亚最后也分裂为三个国家。墨西哥与中美洲的情况也基本类似,对此玻利瓦尔当时曾有描述:“各省起来反对首都,兄弟之间相互残杀,你死我活,誓不两立。乡村同乡村相厮杀,城市同城市交战,各自为政,山头林立。中美洲血流成河,笼罩着一片恐怖!”^②这样,在1811~1825年,在原来西班牙帝国所属的美洲大陆上产生了15个独立国家。独立战争的结果是地方民族主义取代了大陆民族主义。

其实,在克里奥尔人最初形成的民族意识中就存在两重性,即西属美洲殖民地范围的“美洲人”和各行政辖区的“墨西哥人”“秘鲁人”“委内瑞拉人”,甚至更小的某市镇人。一方面,他们发展了一种不断增强的自我意识,一种他们是美洲人而非西班牙人的意识;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了美洲人之间亦存在着差异,因为美洲是一块非常辽阔和多样性的大陆,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人们能够具体感觉到的首先是他们所在的地区,该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别于其他地区,更与西班牙不同,他们正是在这里找到了他们本民族的家园。

有诸多因素可以解释这种地方民族主义在当时比大陆民族主义更有根基。

首先,宗主国确定的殖民地行政区划奠定了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西班牙国王对殖民地的统治是通过一套自上而下的官僚结构进行的,即设在西班牙的“西印度院”和美洲的总督、都督、检审庭、省长、市长、地方长官、卡西克(酋长)等,西印度院直属国王,其他政府机构和官员不得干预“西印度”事务。这种统治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纵向主义统治”,

① 《西蒙·玻利瓦尔全集》第2卷,第113页。转引自J. L. 萨尔塞多·巴斯塔多《玻利瓦尔:一个大陆和一种前途》,杨恩瑞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第302页。

② 《玻利瓦尔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189页。

表面上的“金字塔”结构和实际上的各自为政并存。一方面,美洲作为一个整体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受到西班牙国王的直接管辖;另一方面,殖民地的总督辖区和都督辖区基本上是各自为政。总督辖区以下的各行政单元之间的上下级从属关系并不严密,各单元都可以与西印度院乃至西班牙国王直接沟通,并相互监督,这种管理方式是“纵向主义”的“分而治之”。殖民地之间的任何横向交往是被禁止的,“未经宗主国允许,殖民地之间什么也干不了”^①。二是相对的封闭性。西班牙实行贸易垄断制度,禁止美洲殖民地与外国商人之间的贸易,禁止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只允许殖民地与宗主国进行贸易。这种经济上的“纵向主义”管理造成殖民地各部分的隔阂,形成相对封闭的“市场区”,经济单元往往与政治单元重合在一起,“美洲似乎是分散的一个个岛屿,一块块的管辖地”^②,以至于美洲各殖民地与欧洲之间的联系比各殖民地之间的联系更加便捷。1825年玻利瓦尔在秘鲁时指出:“我们知道加拉加斯的消息晚于俄国的消息;我们先从英国,而不是从加拉加斯收到胡宁发出的报告;有时,我们同时收到伦敦和波哥大同天的报刊。”他还在拉普拉塔写信给朋友说:“我们在这里收到欧洲的消息,总是比波哥大的新。”^③西属美洲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山脉崎岖、交通不便,本来就存在着自然屏障,而人为的政治障碍更增加了各地的封闭状态。因此,从独立后产生的共和国看,基本上都是以殖民地时期的行政单元为基础建立的。

其次,西班牙中世纪市镇传统为地方民族主义提供了合法依据。在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中,卡斯提国王为了排除贵族的威胁而与市镇联合,因此,市镇的地位得到提高,到13世纪达到顶峰。市镇政府代表了第三等级的声音,市政会的成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市镇代表被允许参加中世纪西班牙议会,这比英国平民参加议会早了一个世纪。^④但14世纪之后,国王成功地将权力强加给市镇,每个市镇都派驻了地方长官,市镇的自由受

① D. 博埃斯内尔 《拉丁美洲国际关系简史》,商务印书馆,1990,第17页。

② J. L. 萨尔塞多·巴斯塔多:《玻利瓦尔:一个大陆和一种前途》,杨恩瑞等译,第160页。

③ J. L. 萨尔塞多·巴斯塔多:《玻利瓦尔:一个大陆和一种前途》,杨恩瑞等译,第161~162页。

④ 吉恩·希波莱特·玛丽艾霍 《费尔迪南德和伊萨白拉的西班牙》(Jean Hippolyte Mariejol, *The Spain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罗格斯大学出版社,1961,第287页。转引自O. 卡洛斯·斯托艾策尔《西班牙美洲革命的学术根源》,第8页。

到了抑制。由于新大陆的征服酷似“收复失地”运动，要求国王给予征服者类似的慷慨许诺，西班牙市镇政府的自治传统又得以复活，并且得到了比在卡斯提王国时代更多的权利和权力：分配土地、征收税赋、维持治安、创办公共工程、监督市场价格、规范节日活动等。市政会可以选举其自己的议员和市长，可以派代表觐见国王申诉冤情，在省督（Governor）死亡暂无代理的时候，它承担整个地区的行政管理职责。1560年的一项给委内瑞拉城市的国王敕令宣布，在省督死亡的情况下它们可以像“城市国家”（City States）一样管理自己。^①在遇到重大事变的时候，市政会可以召开公开的市政会（Cabildo Abierto），所有当地居民都可以参加，以讨论决定应该采取的对策。同样重要的是，如果国王的敕令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市政会可以借助拖延或请求澄清敕令的方法，不予执行。“我服从，但不执行”（Obedezco pero no cumplo）是当时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但是，随着总督辖区、检审庭、都督辖区等行政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政会的自治功能逐渐衰退。特别是菲利普二世卖官鬻爵的政策实施之后，市政会的重要位置为有钱人所把持，市政会逐渐蜕变成一种寡头政权。直到18世纪中叶，随着大量西班牙新移民的涌入，克里奥尔人的民族意识再度被激活，他们极力捍卫自己的政治权力。市政会代表着一种发展中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公民传统，拥有较大的自治权，成为独立运动的温床。当独立时机来临后，它们利用原有的市政会权威和自治基础，纷纷行动起来，召开公开的市政会，组建地方“洪达”，不少市政会成了独立运动的领导力量。

最后，民族意识的生成和报刊的印刷发行具有地方性特点。不同地区的克里奥尔人民族意识的觉醒与他们所在地区是分不开的，被驱逐的智利耶稣会士、克里奥尔人胡安·伊格纳西奥·莫利纳说：“只有失去智利的那些人才懂得珍视智利。”^②克里奥尔人不能不首先受到其所在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所处地区的自然面貌、历史、资源和财富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并从中产生了认识自我的文学和科学，那些文学家和科学家赞颂自己所在地区的历史和资源。如布拉丁认为，就墨西哥

① O. 卡洛斯·斯托艾策尔《西班牙美洲革命的学术根源》，第11页。

② 谢尔登·B. 利斯、佩吉·K. 利斯编《拉美历史中的人、国家和社会》（Sheldon B. Liss and Peggy K. Liss ed., *Man, State, and Society in Latin American History*），伦敦波迈出版社，1972，第112页。

而言,克里奥尔人爱国主义的构成因素是“对阿兹特克历史的颂扬,对殖民征服的贬低,对半岛人的仇视,对瓜达卢佩圣母的热爱”^①。胡安·德贝拉斯科将他的“祖国”基多王国展现为受益于大自然最多的国家之一。“如果不首先欣赏大自然以其杰作所做出的特殊努力,理解这片土地的结构和轮廓将是不可能的。”他说:“基多王国可以为自己拥有美洲其他部分或全球的任何其他部分都没有的特征而感到自豪。”基多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自然赋予它拥有最高的山峰,最长河流的源头,并享有地球上最温和的气候。^②智利的戈麦斯·德比道雷在他的《地理历史》中,一开始就写道:“智利王国……是受益于大自然最多的国家之一。”^③在新格拉纳达探险8年的克里奥尔律师佩德罗·费尔明·德巴尔加斯(Pedro Fermín de Vargas)认为,新格拉纳达是一块具有无与伦比的商业潜力的土地。^④按照他的说法,新格拉纳达享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在那里有可能“发现几乎所有的全球特质”。由于因安第斯山脉创建的多种生态小环境和其赤道气候带来的无尽的农业周期,哥伦比亚是地球的缩影。它也是一个潜在的世界经济领袖。伊波利托·乌纳努埃(Hipólito Unanue)是《秘鲁水星报》的编辑,他认为秘鲁是“自然在地球上所创造的最壮丽的工作”^⑤。秘鲁拥有向大西洋或太平洋排水并连接两个大洋的河流,以及世界上最丰富的植物资源。克里奥尔科学家还认为,美洲的自然法则与欧洲的自然法则不同,美洲的现象只能由克里奥尔科学家来研究。墨西哥克里奥尔博物学者何塞·安东尼奥·德

① 戴维·布拉丁:《墨西哥民族主义的起源》(David Brading, *The Origins of Mexican Nationalism*),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第3页。

② 贝拉斯科《基多王国的历史》(Velasco, *Historia del Reino de Quito*)第1卷,第11~12页,转引自豪尔赫·加尼萨雷斯·埃斯格拉《民族和自然:自然史和克里奥尔民族认同的加工》(Jorge Cañizares Esguerra, “Nation and Nature: Natural History and the Fashioning of Creole National Identity in Late Colonial Spanish America”)提交拉美研究协会第20届大会的论文(1997年4月瓜达拉哈拉),网络版,第5页。

③ 戈麦斯·德比道雷在他的《地理历史》(Gomez de Vidaurre, *Historia Geográfica*)第1卷,第3页。转引自豪尔赫·加尼萨雷斯·埃斯格拉《民族和自然:自然史和克里奥尔民族认同的加工》,第5页。

④ 豪尔赫·加尼萨雷斯·埃斯格拉《民族和自然:自然史和克里奥尔民族认同的加工》,第5页。

⑤ 伊波利托·乌纳努埃《秘鲁的自然地理》(Hipólito Unanue, “Geografía Física del Perú,”),《秘鲁水星报》(*Mercurio Peruano*)1792年第4期,第21页。转引自豪尔赫·加尼萨雷斯·埃斯格拉《民族和自然:自然史和克里奥尔民族认同的加工》,第6页。

阿尔萨特 (José Antonio de Alzate) 认为,新西班牙充满了植物的奇迹,这些奇迹与欧洲人设计的自然法则总是发生矛盾。“如果伟大的欧洲博物学家曾经来到新西班牙的话,他们面对这么多种类和这么罕见的自然物产将会傻眼。新西班牙拥有完全破坏和颠覆所有科学假设的自然现象。”^① 克里奥尔知识分子对他们所在地区历史和自然的奇异性的描述,增强了人们对本地区独特性和差异性的感受,有助于形成独特的民族空间,强化地方主义的民族认同。

报刊的印刷与发行在后蒙思想传播和地方民族主义形成中占重要地位。在 17 世纪末,西属美洲只有墨西哥和利马两地有印刷机,而它们所印行的基本上是教义问答和布道手册。到 18 世纪末,一些新的大学和印刷所相继建成,报刊也由原来的两种或三种增加到二十种以上。^② 如《墨西哥报》是墨西哥在 1667 年出版发行的第一份正式报纸,到 1737 年,再版了《马德里公报》,另外还有《墨西哥文学日报》(1767~1768 年)、《信使导报》等。在秘鲁有《利马公报》(1743 年),还有《利马文学经济商务日报》,即后来的《秘鲁信使报》(1791~1795 年)。1791 年 1 月,伊波利托·乌纳努埃创办了《秘鲁水星报》(El Mercurio Peruano, 1791~1795 年)。此外,还有基多的《基多文化入门》(1792 年)、中美洲的《危地马拉公报》(1797~1810 年)、新格拉纳达的《新格拉纳达王国周报》(1808~1811 年)、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报》(1808~1821 年)、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日报》(1810 年)、智利的《智利晨报》(1812 年)等。这些早期报纸一般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市场的附属品”,商业新闻占重要地位;二是地方性,以满足本地读者兴趣和需求为主。因此,报纸在加强克里奥尔人的联系和形成其民族认同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当然,报纸也会登载母国和其他殖民地的经济和政治消息,特别是在独立战争前夕,后蒙思想的新观点和经济实用知识成为报纸刊登的主要内容。但是,由于当时报纸还不够普及,有的地区甚至没有报纸。“传播革命思想的仅有方法就是互相交谈和私人通信”^③,因

① 豪尔赫·加尼萨雷斯·埃斯格拉 《民族和自然:自然史和克里奥尔民族认同的加工》,第 9 页。

② 谢尔登·B. 利斯、佩吉·K. 利斯编《拉美历史中的人、国家和社会》,第 114 页。

③ 路易斯·加尔达梅斯《智利史》,辽宁大学历史系组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75,第 286 页。

此,正如安德森所言,由于西属美洲18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和科技发展的水平一般,甚至某些地方的落后,创建一个永久的泛西属美洲民族主义的试图遭到了失败,而北美和后来的印度却能获得成功。^①

总之,由于克里奥尔地方民族主义有着坚实的基础,当独立运动破坏了西班牙帝国原有的权威、政治结构和经济体系之后,大陆民族主义未能形成一个新的有效的权威和政治经济体系取而代之,虽然在反对各地共同敌人(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时候会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但当这个共同的敌人被排除之后,便成了空洞的失去载体的意识形态,缺少了适用性。克里奥尔地方民族主义悄然升起,并日益活跃起来,随着一系列新国家的建立,国家便成为地方民族主义的载体,各国也从此开始了在国家领导下的现代化的历程。与创立独立国家的象征物(国旗、国歌、货币)相比,打造种族一体化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s)的任务更为艰难。

结 语

西属美洲独立战争是在克里奥尔民族主义推动下由克里奥尔精英领导的一次民族独立运动,它基本上完成了驱逐西班牙殖民者、取得民族独立的任务,但是,由于克里奥尔精英民族主义的局限性,他们不愿意与其他种族和阶级分享独立的成果,没有进行重大的社会变革,特别是没有进行土地制度的变革,其所建立的“共和国”也仅仅是以表面的民主掩盖了内在的专制独裁。^②正如智利史学家路易斯·加尔达梅斯所言:“简单地说,这次解放几乎只具有单纯政治的性质,它用共和政体代替了殖民地的君主政体,并且使西班牙人社会集团的优势转移到纯粹智利的克里奥尔人集团之手,但是它却完全没有影响到财产、家庭、劳动、宗教与法律等所赖以建立的制度。”^③智利的情况反映了西属美洲的一般趋势。“因此,有许多农民和奴隶都感觉到,革命不过是换了主人,换了土生白人来代替西班牙

① 本尼迪特克·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叻人译,第60~61页。

② 玻利瓦尔在1826年写信给他的部下桑坦德时说“为着祖国的利益,我要戳穿这一整套华丽的法律制度和我们用空想编造的美丽故事。”见J. L. 萨尔塞多·巴斯塔多《玻利瓦尔:一个大陆和一种前途》,杨恩瑞等译,第253页。

③ 路易斯·加尔达梅斯 《智利史》,第397~398页。

人。”^①玻利瓦尔在他的告别信中写道：“公民们，我惭愧地告诉你们，我们花了一切代价，但取得的仅仅是独立。”^②与此相应，克里奥尔地方民族主义的近期遗产是独立后长期的政治动荡，考迪罗主义盛行。长期遗产则是西属美洲的“巴尔干化”，尽管新建成的民族国家成为现代化的载体，但是大多数新建国家疆域过于碎小，不利于后来的经济发展。

当我们不再认为西属美洲独立战争前夕已经形成多种族融合的民族，不再认为独立运动是一次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之后，^③我们将会减少许多困惑。为什么拉美独立运动之后现代化的启动是那样的迟缓，现代化进程又是那样的艰难？为什么20世纪初会发生“土著主义运动”？为什么今天拉美最大的贫困群体是印第安人和黑人？为什么20世纪中叶之后拉美兴起地区一体化运动，玻利瓦尔的理想再度被各国追求？这些问题都可以从克里奥尔民族主义的两个局限性中找到答案，即在独立前夕，西属美洲多种族融合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并没有形成，在独立战争中，大陆民族主义为地方民族主义所取代。独立战争仅仅是克里奥尔精英领导的一次民族独立运动，并未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反殖民反封建的任务。如果这样定位，即从克里奥尔民族主义而不是从拉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角度看独立运动，独立之后发生的令人困惑的许多问题都就变得容易理解了。

（作者简介：韩琦，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和拉美研究中心教授）

① 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冯明方译，人民出版社，1956，第179页。

② J. L. 萨尔塞多·巴斯塔多：《玻利瓦尔：一个大陆和一种前途》，杨恩瑞等译，第252页。

③ 见王春良《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史论》，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第242页。这也是国内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time, and the some debates are rather fierce. Consensus has not reached yet among German society on some historical issues and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Keywords: Nazism, the World War II,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the Formation and Limitations of Creole Nationalism in Spanish America

Han Qi

Abstract: The upper class of Creole was the leading class of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Spanish America. The formation of their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nationalism is the key to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Creole Nationalism has gone through cultural identity stage and political identity stage in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eventually matured in the stimulation of Metropolitan country emergency, and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afterwards. However, the two limitations of Creole nationalism, i. e. the elite – nationalism and the dominating local nationalism, lead to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panish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pocketed by a small number of Creole elites, and also had negative impacts on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 Spanish America.

Keywords: Spanish America, Creolles, Nationalism, Limitations

Peru in Chinese Historical Literatures

Zhang Xiping

Abstract: From the world maps drawn by missionaries arrived in China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Chinese got to know of Peru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u Yunlong's diary introduced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of China and Peru and recorded his visit to Peru.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Peru in Chinese his-